

本期关注

民企争当新质生产力“弄潮儿”

——来自第六届全国青年企业家大会的报道

本报记者 陈建萍



5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2024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正式对外公布，民营经济促进法被列入立法工作计划。从“民营经济31条”到新设民营经济发展局，再到构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法律和制度保障体系，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稳定预期。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5月16日，由全国工商联、共青团中央共同主办的第六届全国青年企业家大会在武汉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企业家们齐聚一堂，不仅举办了“新生代、新质生产力”主旨演讲，还就未来产业、绿色发展、企业家精神进行圆桌对话。在武汉这座英雄城市和红色热土，青年企业家们瞻仰革命先辈遗迹，接受革命精神洗礼，交流创新发展经验，新质生产力正从两会热词变成民营企业家的自觉行动。

制度供给护航新质生产力

“据统计，全国80%、我省90%的中小微企业家都是青年人，他们为经济的回升向好发挥了重要作用，致力于发展壮大新质生产力，广泛活跃在数字经济等以创新创业为关键竞争力的行业领域，领衔创办了一大批独角兽等企业。我省每两家专精特新企业就有一家是企业青年创办，广大青年企业家作为经济建设主战场的中坚力量，是最有朝气、最有活力、最有创造力的群体。”湖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忠林在开幕致辞时并不讳言对青年企业家的点赞。

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的发言则更直白，“发展科技创新不可不倚重民营企业，民营经济有一种说法叫5、6、7、8、9，民营企业贡献了50%的税收、60%的GDP、70%的科技创新、80%的就业机会和至少90%的企业数量。党中央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新时代广大民营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必须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充分发挥生力军作用，积极主动地肩负起重大历史使命。”

在田轩看来，激励科技创新首先需要公平的竞争环境。“以新能源汽车为例，无论在批发还是零售渗透率现在都超过了传统燃油车，新能源车颠覆传统燃油车的趋势不可逆转。正是因为早期新能源汽车不被看好，所以，才有多种品牌、多个厂商的充分竞争。平等对待激发企业家精神对风险的持续探索，非常灵活的人才机制和科学的决策体系，包括敏锐的市场捕捉和技术的创新，让我们新能源汽车在全世界占有领先地位。”

田轩还进行了一项研究，用42个国家的数据库来分析到底是政策还是政策的不确定性会对市场创新产生影响？结果让人惊讶，其实一个国家的政策本身对创新没有什么影响，不管是激进还是保守关系不大，企业家可以通过调整自己的投资决策适应国家的宏观政策，最要命的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当

政策不确定不稳定的时候，企业能做的事情就是等待或观望，放弃长期投资助长短期行为，所以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一致性对长期创新非常重要。”

全国政协委员、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齐向东表示，“科技创新周期长、风险高、投入大，发展新质生产力好比风险投资，所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急躁，不能今天想干一件事，明天就要求立竿见影见到成效。”正是因为创新本质上是对未知路径的探索过程，是从0到1、从无到有、无中生有的过程，田轩认为，商学院培养不出企业家和创业者，民营企业的信心短期靠政策，长期靠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只有形成组合拳，才能帮助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

创对业、创好业的关键所在

在嘉宾的演讲中，记者听到了一个高频词——初心。

在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泰豪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黄代放的眼中，他的初心是创业的时代如何创对业？如何创好业？他的答案是对接国家需要才能创对业，以科技创新驱动才能创好业。正是因为这份初心，黄代放无悔选择，“我1988年创立了泰豪，始终从那个时代开始走在先进技术的应用和研发产业赛道上，持续强化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人才的队伍建设和企业品牌管理。”

燧原科技创始人、董事长兼CEO赵立东是清华大学85级电子系毕业生，他的初心则是，“过去的前辈以身许国树立了光荣榜样，现在在大国激烈竞争，在高科技领域已经成为主战场、主赛道，我们创立燧原也是希望为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奉献自己的力量。”燧原科技从事的是AI芯片产业，而算力领域的竞争是当下大国竞争的一个重要领域，尽管创业的阻力极大，赵立东依然表示，“英伟达在过去几十年发展AI芯片，形成了非常强的生态闭环和客户黏性，我国发展AI芯片产业如果依赖国外的生态是不能持续的，我们必须要有自主创新的生态和架构。”这是一场艰难的战役，赵立东的态度是，“道阻且

长，行则将至，科技报国，责无旁贷！”

全国政协常委、重庆市工商联主席、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兴海对青年企业家的嘱托是，积极融入国家战略，与时代同频共振。“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40多年，目前各种政策环境比我们当年创业的时候要好多，起点也高，难度也更大，大家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贡献者和实践者，要传承老一辈听党话，跟党走传统，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国之大者，积极融入国家战略，自觉与党的事业同向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以产业报国为己任，争做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同时要传承好老一辈企业家艰苦奋斗的精神。”

张兴海还带来一个好消息，旗下AI-TO问界在今年一季度排名中国汽车市场的豪华品牌销量第五，“这份榜单包含了奔驰、宝马、奥迪的燃油车，不仅指电动车，对于中国新能源汽车而言，目前的地位来之不易。”张兴海表示，“新能源汽车是集三电技术、人工智能、新材料、先进制造等诸多高科技为一体的新兴产业，正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才推动了中国民族汽车品牌向上突破，在百年汽车产业赛道上实现新能源汽车的异军突起。”张兴海透露，截至目前赛力斯问界研发投入已累计超过120亿元，以高强度的大投入深耕电动化、智能化核心技术的自研，未来中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必将在全球竞争中拥有更大的市场话语权。

让人工智能赋能百行千业

自认为是人工智能布道士的全国政协委员，360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周鸿祎压轴登台，他演讲伊始就问大家一连串问题，“相不相信大模型是真智能？相不相信通用人工智能正在加速到来？相不相信大模型是一场工业革命？相不相信大模型将重塑所有产品和业务？相不相信不拥抱AI的公司会被淘汰？相不相信不拥抱AI的员工会被淘汰？”周鸿祎的回答是，我们需要建立“AI信仰”，大模型将引领新一轮工业革命，以大模型为代表的的人工智能革命会席卷每个行业，并不是摧毁每个行业，而是重塑每个行业。

周鸿祎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了“人工智能+”的概念，“人工智能+”是指不要抽象去搞人工智能，而是把人工智能和大模型与中国的各个传统产业、传统业务，特别是新兴制造业，找到应用场景进行很好的结合。周鸿祎并不认为open AI是唯一出路，包括刚刚发布的GPT-4o大模型，虽然看上去很酷，中国企业完全可以逆向思维，结合自己企业的某个场景打造专业的大模型。“每个企业和行业都有自己独到的知识和数据，这些知识和数据在互联网找不到，GPT永远无法把这些数据训练进去，这是通用大模型最大的软肋。”周鸿祎的设想是，如果有1万家传统企业开放场景，训练1万个垂直和专业大模型，让企业无论是对外服务还是对内管理，整个运营流程都能真正提质增效，这是新工业革命的良好开端。“人工智能是人类有史以来发明的最伟大的生产力工具，我们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把大模型拉下神坛，让每个企业都能结合自己的业务用得起来。”周鸿祎讲述了自己的小目标。

齐向东有着同样的感触，“面向未来我们应该看到‘人工智能+’是一个巨大的趋势，可以说未来千行百业不管什么产品，如果不加人工智能这个产品可能卖不出去了。”齐向东介绍，网络安全是“人工智能+”的最优先方向。目前网络安全攻防上最尖锐的矛盾，就是防御的专家多，攻击者少，面对专家稀缺和饱和式攻击的矛盾，应用人工智能则可以解决问题。“奇安信发布了首个工业级大模型安全人工智能产品QAX-GPT，这个机器人可以代替人工智能专家处理网络安全攻击问题，一台机器人相当于50到60个网络安全专家的工作量。通过机器人的非线性扩充，就能解决在网络攻防方面不对称的问题，使我们的防护始终处于不饱和和有效的状态。”

推出“日日新SenseNova大模型”多维度刷新人们对AI认知的全国工商联物联网委员会主席团团长、商汤科技董事长兼CEO徐立的判断是，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化是必然趋势，由于各层的能力模型和竞争壁垒差异较大，当AI在各个行业的落地向深水处挺进，产业规模不断增大，随着需求难度和规模的变化，产业链会出现自然分化，建议尽快建设全国人工智能算力一张网，打造国产化人工智能算力集群。

除了技术创新、资源节约，中国企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努力方向是产品品质。高品质的产品，是高水平生产力的体现；高水平的生产力，也必须指引产出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面对中国现实，这个品质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产品品质，要过硬；第二，技术含量，要够格；第三，产品价格，要合理。过去我们被冠以“世界工厂”，主要还是从数量上来说，但从需求侧、供给侧的微观环节来看，性价比好、适销对路、流速快的商品还是不够。

衡量企业、行业好坏的标准，从来不是“传统”还是“新兴”，也不是“模式”与“路径”，而是质量与效益。模式企业通过高瞻远瞩的战略布局、持续不断的创新来推动产品提质、经营提效，就可以持续成长、不断壮大，甚至成为创新型领军企业，也就能给予社会、股东、员工等利益相关方更好的回报。中国企业在提高发展质量、重塑增长机会、扩大投资回报方面，还是大有可为。

(作者系玉台塾、蓝美咨询首席顾问)

委员声音

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启动。每逢经济面临大考，国债的发行都对经济恢复和长期向好起到“固本强基”的作用。此次发行的超长期特别国债有哪些特点？对我国短期经济与长期现代化建设有何重要意义？在发行过程中应该如何实现决策体系与市场的有效互动？此时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对中国经济将产生哪些影响？对此，本报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原主任、教授韩保江。

记者：何为超长期特别国债？我国在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方面有何历史经验？

韩保江：特别国债是财政部根据国务院授权，在特殊情况下发行的一种国债。它和普通国债不同，特别国债的发行目的是为了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或者重大战略需要，而不是为了平衡财政预算。特别国债的发行规模和实践不受常规预算安排和年度限制，而是根据特殊需要灵活确定。特别国债的使用范围也很广泛，可以用于补充金融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社会民生、国防安全等方面。

迄今为止，我国共发行过五次特别国债。从发债规律来看，每一次特别国债的发行都与当时国家面临的特定经济挑战密切相关，通过这种方式，政府能够筹集到大规模的资金，针对性地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记者：从今年开始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有何重大意义？

韩保江：这次发行的超长期特别国债意义重大，它既着眼于“固本”我国经济回升向好的“应急之需”，也着眼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长远之需”。

从当务之急看，一方面，中国经济在经历长期快速发展后，进入新常态，增速有所放缓，面临结构性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压力。特别是在疫情后，经济复苏的基础尚需巩固，总需求仍然不足，尤其是短期内消费和投资动力有待增强。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旨在通过扩大政府投资，促进内需，稳固经济增长基础。另一方面，在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向市场传递了政府积极应对经济挑战、致力于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决心，有助于增强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稳定市场预期，促进资金流向实体经济。

从长期效用看，本次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预计将重点支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基础设施现代化、绿色发展、乡村振兴等关键领域，这些都是中国经济长远发展和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有助于提升国家竞争力和高质量发展，进而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记者：此次发行的超长期特别国债有何特点？

韩保江：第一，专款专用。此次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是为了系统解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进程中一些重大项目建设资金问题，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

第二，超长期特别国债不列入财政赤字，相对于其他类型的国债来说，收益更高，更具投资价值，更具吸引力，更好撬动、激发社会资本的价值。

第三，直接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此次超长期特别国债设计20年、30年、50年三个档期，与党的二十大确立的我国“两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战略相匹配，本质上是以支撑实现中国现代化战略为导向的。

记者：在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中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韩保江：第一，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是国家行为，需要进一步提高透明度。在发行制度安排、获取准入路径等方面，要做到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第二，要谨防“二道贩子”变相转让炒作，要加强监管，做到依法依规。第三，发行中要保障国债资金使用安全，针对资金用途、使用效益等要建立明确的评估与反馈体系。

记者：如何避免发生“钱等项目”的情况？

韩保江：从政府债券规模看，今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与新增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两项加起来达到4.9万亿元。此外，2023年四季度增发的1万亿元国债，部分资金也在今年使用。因此也有很多人在担心，应该如何妥善统筹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府债券资金，才能避免出现过往“钱等项目”的情况。

目前看来，此次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应该不会出现“钱等项目”的问题。从各种信号来看，国家已对资金用途和使用方向有了明确的计划与部署；同时，目前存在资金缺口的项目也比较多，比如乡村振兴，对资金的需求非常迫切。从历史发行情况来看，相关部门多年来不断完善相关体制机制，尽可能把相关要求提前通知地方，给地方预留必要的准备时间，同时指导地方加强项目库建设，扎实做好项目储备等前期工作，为直达资金精准高效使用发挥作用、打好基础。

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启动 筑牢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

——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原主任、教授韩保江

本报记者 孙琳

学人观潮

传统企业更应体现“新质生产力”要求

黄治国

在这样一个新时代、新经济、大变局、大转型的背景下，“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强调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这些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正当其时。但是，新质生产力不只是针对“新经济”的需要，是对整个经济形态的总体指引，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企业更应体现“新质生产力”的要求，因为这部分企业数量更多、涉及更广、消耗资源更多、面临转型的任务更迫切。许多传统产业、传统企业如不能提升经营质量，就会不断增加社会负担、降低社会经营活力；而若能不断提升经营质量，则不仅能够从微观层面改善自身经营，更能从宏观层面为国家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过去几十年来，我国经济依靠资源禀赋迅速融入世界，爆发出罕见的强大力量，一路高歌猛进，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也诞生了一批世界级的优秀企业。但是在微观企业层面，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整体面有多好，仍然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中，非

常突出的就是机会依赖、资源依赖、路径依赖，由此导致长期性如技术、产品等方面的投入不足，经营粗放、效率不高，创新能力仍然不够，抗风险能力不强。这也是转型时期，许多中国企业难以适应并有效转型的根本原因。

回顾中国经济与企业群体的成长，其实是基于大机会时代的顺势而为。再看今天的内外环境，与过去已经截然不同，它不再是一个大机会时代，而是一个需要去创造的时代；资源的成本也不再低廉，需要不断增加附加值；国际贸易环境也不断变化，各种风险交替增加，经营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新质生产力的要求，希望可以唤醒还在沉睡中的中国企业，也希望更多中国企业，敢于直面自身的问题，借机反省改造，努力交出合格答卷。

一是发展路径要由“机会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根据《中国企业500强20年报告（2002-2021）》数据显示，自2005年有统计以来，中国企

业500强平均研发投入强度尽管保持增长趋势，但总体投入强度并不高，平均维持在1.15%。这就意味着创新还没有成为企业发展的驱动力。当下，许多企业发展面临很大困境，但往往并不从自身找原因，而把问题归结于环境和机会，这是对企业内部的经营实力、外部的发展要求认识不够。新质生产力的含义，当然需要创新驱动，当然需要加大研发投入。企业需要从持续经营的高度，对此进行战略规划与准备，加大研发与技术投入，并在经营过程中不断检讨检验修正，让创新要素越来越多。

二是发展方式要由“高投入”向“高效率”转变。从我们多年的实践来看，许多企业在人、财、物的效率上还有很多改善空间，也就是说，在不需要增加太多投入的情况下，经营成果还能有更好的产出。从2022年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数据可见，中国内地上榜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为5.1%、总资产收益率为1.15%、净资产收益率为9.5%，而美国企业的三个指标分